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陈光林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陈光林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陈光林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238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209—00694—X

A·15 定价：4.35元

目 录

序 官	1
第一编 陈云经济思想的理论支点	16
第一章 国情论	19
第一节 重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 经济的特点	20
第二节 重视我国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	27
第三节 对我国国力有清醒的认识	35
第四节 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尤为重要	39
第二章 规律论	44
第一节 重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45
第二节 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54
第三节 重视运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64
第三章 综合平衡论	74
第一节 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74
第二节 综合平衡的实质是按比例	79
第三节 综合平衡的关键在于财政的平衡	82
第四章 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86
第一节 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86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	90
第三节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98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11

第二编 陈云经济思想的体系	113
第一章 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114
第一节 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114
第二节 提出和制定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政策.....	115
第三节 对错误倾向的纠正.....	116
第二章 国营经济为主体,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118
第一节 对所有制形式的总体构想.....	118
第二节 实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	122
第三章 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125
第一节 计划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体.....	126
第二节 有计划就是按比例.....	127
第三节 农、轻、重协调发展.....	129
第四章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35
第一节 “相结合” 思想的最早提出.....	135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	138
第三节 在实践中探索.....	143
第五章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147
第一节 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是稳定经济的 重要条件.....	147
第二节 不适应就要调整.....	149
第三节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156
第四节 量力而行留有余地.....	159
第六章 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162
第一节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162
第二节 坚持“两先” “两后”	164
第三节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	167

第七章 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173
第一节 开步走就要搞好综合平衡·····	173
第二节 按短线搞综合平衡·····	174
第三节 从总量上控制生活资料商品的供需平衡·····	175
第四节 以物资供应总量制约基建投资总额·····	176
第五节 计划留有余地·····	177
第八章 必须讲求经济效益·····	179
第一节 讲求经济效果是处理一切经济问题的 基本出发点·····	179
第二节 从多方面争取经济效益·····	182
第九章 积极慎重地利用外资·····	187
第一节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187
第二节 积极利用外资·····	188
第三节 保持清醒的头脑·····	190
第十章 经济和政治互相配合·····	194
第一节 “七分经济，三分政治”·····	194
第二节 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200
第三编 陈云经济思想实践的方法论·····	203
第一章 领导经济工作的突出特色·····	203
第一节 唯实辩证·····	203
第二节 注重调查·····	209
第三节 善于总结·····	215
第四节 勤于学习·····	221
第二章 时刻把握全局·····	229
第一节 用大政方针统一思想·····	230
第二节 综合分析和考察经济生活中的矛盾·····	232
第三节 全面规划经济工作·····	233

第四节	分别轻重缓急·····	235
第五节	忍小谋大·····	236
第六节	反对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	237
第三章	善于抓住重点·····	24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	240
第二节	创造性应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	243
第三节	抓重点的方法也是财经部门的重要工作 方法·····	247
第四章	比较进行决策·····	249
第一节	对方案选择的比较决策·····	249
第二节	在决策实行过程中的比较方法·····	255
第五章	谨慎稳妥具体·····	260
第一节	慎之又慎·····	260
第二节	具体细致·····	266
第三节	算帐求益·····	270
第六章	多谋以求善断·····	277
第一节	要有预见·····	277
第二节	要有一批勤想问题的人·····	278
第三节	要建立经济研究和参谋机构·····	279
第七章	发动依靠群众·····	281
第一节	遇事同群众商量·····	281
第二节	经常相互通气·····	286
第八章	研究新情况新对策·····	291
第一节	不断研究新情况·····	291
第二节	重视提出新对策·····	301
后 记	·····	313

序 言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长期主持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参与和主持制定党的重要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有着特殊的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后40多年的历史，成功与失败，前进与曲折，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陈云同志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思想、观点以及他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陈云经济思想和观点的难能可贵。陈云同志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的领导者，他的重要经济思想和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和领导方法，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丰富的实践，是陈云经济思想与方法的源泉和基础。学习和研究陈云经济思想和领导办法，必须了解陈云同志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历史进程和丰富实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陈云同志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实践，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段，从1949年8月建国前夕到1956年7月党的“八大”。

早在1948年夏，陈云同志就曾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作为党在东北地区的领导者之一，对解放东北、恢复东北的

经济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6月，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在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从1949年到1956年，在我国革命的这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及其领导方法都是正确的。这期间，陈云同志所提出并得到贯彻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工作思想、原则、方针和政策，以及他领导经济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与艺术，都对我国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起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因而他的工作受到全党同志的完全信赖、支持和称赞。对于他的经济工作方面的一系列意见，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有很高的评价。他赞扬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除了没收和改造官僚资本企业，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外，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即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实行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所有这些，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有步骤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

从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我国曾出现四次物价波动，但由于中央采纳了陈云同志的意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斗争艺

术，我们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抵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了通货的恶性膨胀。1950年10月，我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坚定地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不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力量。1952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已大体结束，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经胜利在望，平稳财政收入和稳定物价的目标已经实现，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把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他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为了顺利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3年10月前后，陈云同志经过周密调查和反复考虑，向中央建议对粮食问题采取彻底解决办法，即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也就是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重大决策，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全力支持，并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随后，中央作出了正式决定。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随后实行的棉花、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对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是有力的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并在实践中取得胜利，使我们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以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开始，陈云同志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负责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工作。由于陈云同志杰出的领导工作，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1956年上半年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义改造任务，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小商小贩也基本上组织了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一年。1956年9月，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总结。陈云同志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为中心议题，在党的八大上作了一次重要发言。他正确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个体经济是补充；国家的统一计划是主体，自由计划是补充；社会主义的国营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当时，周总理、陈云同志还正确地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八大”也提出了反对“左”倾冒险的问题。“八大”以后，我们党在工作中实际上对经济冒进进行了调整，因而，1956年、1957年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总之，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由于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统购统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建设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根基就奠定了下来。当然，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工作中也有缺点和不足。如出现了1953年和1956年两次“小冒进”，1954年粮食征购多了些，社会主义改造中某些方面不该集中的集中了，不该合并的合并了，步伐过快，工作过粗，等等，但这些比起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来，则是极为次要的。当然，这段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工作成就，不能说是陈云同志一人的功劳，正如陈云同志在出版他的著作时所叮嘱的：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

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但是尽管如此，陈云同志杰出的工作和特殊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陈云同志在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的严重斗争中，在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观点、方针和方法，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发挥，他的经济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也得到了充分表现。

第二段，从1956年下半年到60年代初期。

在这段历史过程中，以反右倾斗争为起点，在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逐步扩大化，在经济领域“左”的思潮和“左”的错误也越来越严重。1956年，陈云就总结了经济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指出当时不顾实际、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1956年底到1957年初，他先后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必须和国家建设相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重要观点以及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11月，在反右派斗争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批评反冒进，提出“反右倾”，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是所谓“右倾”、“促退”。接着，1958年初，在中央召集的几次会议和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都连续对“反冒进”进行抨击，指责“反冒进”是给6亿人民泄气，打击了6亿人民的积极性，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错误”等等。这些与陈云经济思想相对立的“左”的错误，使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受到排斥。他所提出的完全正确的“国力论”、“三大平衡论”，被批评为“右倾”、“消极平衡论”。

事实是，对陈云同志正确经济思想的否定，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在政治上批掉了民主作风，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工作指导上使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速度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起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随之泛滥。“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这次会议后，日益突出地鼓吹高速度，计划指标越抬越高。1958年4月，不顾客观实际条件，提出钢产量翻一番，要从1957年的530万吨猛增到1070万吨。在各协作区农业会议上，也纷纷提出很高的“大跃进”目标。在所有制方面，也出现了急于进一步过渡的倾向，提出对小型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要严厉加以限制，加强改造，组织他们加入各种合作组织。在农村，1958年春就通过了把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并先后在各地展开。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发表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提出产量要翻番，即从1957年的3500亿斤猛增到7000亿斤，1959达到8000~10000亿斤。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强调采取所谓“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的方法，背弃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这时，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纷纷提了出来。这种“左”的思想和行动，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纠正。这次会议，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

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发展。他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大家认真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11月，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研究解决这类问题。除了继续批评“共产风”外，提出要在1958年12月到1959年期间整顿人民公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还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除了。他还指出，“1070”的钢指标是个冒险的计划，主张把1959年的钢指标压下来。随后，又在武昌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对1959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机床由30万台降为13万台；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这次会议在肯定“大跃进”的同时，承认在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比例失调。会议提出，1959年必须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破除迷信，敢说敢干，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反映了这一期间党中央在纠正公社化错误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1959年2～3月，中央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这次会议比较系统地检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情况，对“左”的错误的认识和纠正又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指出，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

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他认为，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 and 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是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而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这两种倾向，都包括有否认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内。他强调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个文件本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规定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三级核算，以生产队（其规模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的体制；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要适当积累，合理调剂；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可以有合理的差别。

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和波浪式前进的问题，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检查了整社工作，并对人民公社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对1959年计划尤其是钢指标的安排仍感到不踏实，委托陈云同志专门调查研究。陈云同志经过3个月的系统调查，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定把钢指标压缩为1300万吨，钢材落实到900万吨。这个指标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得到了通过。此后，陈云同志就去休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和一些同志座谈经济工作时说，国民经济过去安排的顺序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陈云过去讲

过，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人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是对的。从而肯定了陈云同志的这一重要经济思想。

1959年7、8月间，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7月2日开始，原来是准备总结经验，纠正当时所认识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当时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按照农轻重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还提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鉴于许多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他提出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总结经验，认识客观规律。但是，在会议讨论期间，当彭德怀同志于7月14日提出著名的“意见书”以后，会议立即转向反“右”，这就使本来没有解决好的“左”倾错误得到更加严重的发展。从8月2日到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揭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作出正式决议，进一步把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干部。从此，不但中断了原来纠正“左”的错误的正确进程，而且进一步使“左”的错误在各地继续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在“左”倾思想继续发展的影响下，1960年上半年，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大跃进”。这次跃进，制定了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1960年3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工业总产值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29%，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增长12%，钢产量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原煤产量从3.47亿吨增加到4.25亿吨，增产22%；粮食产量从5041亿斤增加到5940亿斤，增产10%；棉花产量从4820万担增加到5300万担，增产10%；生猪从1.8亿头增加

到2.4亿头，增产13%；铁路货运量从5.4亿吨增加到7.2亿吨，增加33%；汽车货运量从3.4亿吨增加到5.4亿吨，增加57%；基本建设投资（预算部分）由267亿元增加到325亿元，扩大了21.7%。在这次新的“大跃进”中，重又大搞“小洋群”、“小土群”，提出要有一两千万人上山，否则又是冷冷清清。据统计，当时21个省、市、区的“小洋群”、“小土群”职工曾占职工总数的55.2%。这次新的“大跃进”还掀起了全民性的“技术革命”，企图用高速度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进而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由于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出现了不少浮夸、虚假和浪费现象。在这次新的“跃进”中，由于大办城市人民公社，普遍推行城乡公共食堂化，形式主义的东西盛行一时。

由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我国经济建设中虽然也确实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取得了某些重要建设成就，但整个看来，国民经济的全面比例失调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1）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一五”时期，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只占24.2%，而在这3年内，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3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时期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都是建国以来最高的，而积累的效果极差。从1957到1960年，由于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超过实际可能，建设项目的投产率（即全部建成投产项目个数占施工项目个数的比例）由26.4%降低到9.8%。“一五”时期，每百元积累新创的国民收入平均达35元，经济效果比较好。从1958到1960年，每百元积累新创的国民收入分别为55元、19元、-0.4元。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过多集中在生产建设上，忽视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二五”前三年，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总额比重比“一五”时期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不能不影响到城